

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变迁研究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

王富百慧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使用2008年CGSS调查数据,通过对“职业获得模型”的改进分析了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依据生命历程理论中“时间”的三个维度,发现在“历史时间”的影响下女性职业地位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并在“社会时间”作用下出现分化。职业发展历程具有浓厚的“社会性色彩”,从另一个视角诠释了人口转变理论,将其引向深入。

关键词:生命历程,职业地位,人口转变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2)05-0145-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过去几十年里,在全球关注女性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女性的就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妇女赋权的进展和教育、就业等方面机会的增加为女性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生育模式的转变,使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生育负担,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职业女性。这一系列变化改变了女性原有的生命轨迹,生命历程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女性自身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如在业率偏低、就业困难、两性收入差距较大等就业问题,女性职业地位亟待提高,生存和发展环境急需改善。

二、文献回顾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生命中经历的事件具有多样性,人的生命过程是由包括出生、入学、婚姻、生育、就职、退休、死亡等一系列的生命事件组成的,强调个体生命事件发生的轨迹,并以此为着眼点,强调轨迹的变化与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1]。它将“时间”划分为“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历史时间”三个维度,生命时间代表传统的生理“年龄”概念;社会时间代表对生命事件发生的社会预期,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个体入学、结婚、生育、就职等生命事件存在及发生、发展模式的社会普遍认可;历史时间强调关注历史事件和社会环境对人的生命轨迹的影响,致力于找寻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2]。

就业是个体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既是自身发展的途径,也是衡量个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重要标志,表现为获得社会角色的过程。女性就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其中,对女性职业地位的讨论不绝于耳。职业地位,通常是指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某一职业的综合价值评价^[3],社会体系中,职业地位通常具有层次性和不平等性,是社会大众对不同职业自身表现出来的等级形式的普遍认可,蕴含着“社会时间”的意义。与此同时,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制度历经变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引发女性就业模式的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将女性生育期缩短,为其寻求自身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历史时间”的作用下,女性的职业地位、职业层次是否发生了变化及具有何种变化?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生命历程理论中,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

系的“时间”维度通常以“队列”作为承载者,队列分析是联结历史发展与生命历程的关键纽带^[4]。所谓“队列”指具有某一共同起点的一批人,如“同一年结婚的人同属于一个婚姻队列”,“出生队列”则是在相同年份出生的一批人,它是众多“队列”中的以出生年份为标识的“队列”。生命历程理论以“队列”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希望通过真正的过程性研究找出历史对个体生命历程影响的痕迹。因此,本文以“出生队列”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中国剧烈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

三、数据与方法

职业地位的评价有三个维度,即经济地位、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5],其中最常见的是西方学者探索出的一套对职业地位主观评价的方法——职业声望测量。但该指标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是人们对各种职业所作的主观评价;其次,只能获得少数职业的声望得分,无法确定所有职业的声望位置;第三,它无法对引发职业地位变动的因素给出合理的因果解释。

布劳—邓肯(Blau & Duncan)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弥补了上述不足,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了较为简单的地位获得模型。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这两个核心概念出发,以个人在社会流动中获得的职业地位作为因变量,建立因果模型^[6],开创了地位获得模式的研究。其基本原理是:基于职业声望值、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三个重要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计算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构建回归方程,然后通过回归方程计算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依据回归方程计算得出的声望值,实际上是利用各个职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估算而来的,被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 economic index),简称为SEI。它不仅成为衡量职业地位的重要标准,还被广泛运用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研究中。

与西方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职业地位的评价更为复杂。学者们利用布劳—邓肯的回归方程测算社会地位时,效果未如预期般理想。以往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不同所有制单位的职业给予的地位评价是不同的^[7],个体职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所置身的单位地位,再分配体系中资源的摄取要通过单位地位实现^[8]。权力因素是判断职业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对职业地位获得具有影响^[9]。此外,在中国存在一些收入较高但层次较低的职位,在不同时期职业地位存在差异,以个体户为例,改革开放前属于受歧视的职业,市场经济之后受歧视程度有所减弱。这些

收稿日期:2012-06-12

作者简介:王富百慧(1983-),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

职业与国有企业、政府机关相比职业地位较低,但收入并不低,被划分为受歧视职业。因此,学者们对布劳-邓肯的回归方程加以改进,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方程的解释力,认为对职业地位的判断不仅取决于收入和教育,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也将根据研究需要对方程作适当的调整,以期得出更加有效的结论。

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的作用下,各个出生队列的女性职业地位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历史事件的足迹在职业地位的变化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职业层次也因“历史时间”和“队列”的不同呈现差异和变化。因此,本文从队列视角构建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既有“历史时间”背景的宏观影响,也有包括诸如个体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微观层面上的特征。通过构建职业地位获得模型,计算用于衡量女性职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探寻女性职业地位和层次的变化历程。为了满足分析需要,我们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为CGSS)2008年调查数据,该数据涵盖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信息,数据质量较高,具有满足研究所需的各种变量,尤其是家庭成员信息很好地契合了我们研究导致职业地位获得的先赋性因素的需要。

四、模型结果

依据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我们在原有职业收入和受教育年限两个变量基础上,增加权力因素、部门因素、社会歧视因素^①三个变量,得到方程如下:

$$\text{职业地位} = 61.41 + 0.375 \times \text{受教育年限} + 0.032 \times \text{月收入(百元)} + 5.250 \times \text{最高管理者} + 3.337 \times \text{中层管理者} + 0.785 \times \text{基层管理者} + 8.680 \times \text{党政机关} + 7.195 \times \text{事业单位} + 2.352 \times \text{企业单位} - 21.257 \times \text{受歧视职业}$$

权力因素中,管理层次越高职业地位也越高,且对职业地位的影响力也就越大。部门因素也就有相同的规律,部门层次越高,职业地位对职业地位的影响力越大。歧视性因素对职业地位起到负向作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职业地位的提升。教育与权力因素、部门因素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0.75和0.90,我们认为教育为女性进入权力层和管理层提供可能,而职业所具有的权力特征和管理职能决定了该职业的地位(表1)。

表1 女性职业地位获得模型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受教育年限	0.375***	0.033
月收入	0.032	0.003
权力因素		
高层管理	5.250***	0.499
中层管理	3.337***	0.512
基层管理	0.785**	0.363
部门因素		
党政机关	8.680**	0.598
企业单位	7.195***	0.239
事业单位	2.352***	0.338
歧视因素	-21.257***	0.217
常数项	61.41***	0.426
解释比例 R ²	88.1%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进一步讨论城乡之间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差异,分别构建城乡职业获得模型,得到方程如下:

$$\text{职业地位(农村)} = 58.360 + 0.382 \times \text{受教育年限} + 0.021 \times \text{月收入(百元)} + 2.94 \times \text{最高管理者} + 1.256 \times \text{中层管理者} + 1.389 \times \text{基层管理者} + 1.167 \times \text{党政机关} + 1.483 \times \text{事业单位} + 3.132 \times \text{企业单位} - 32.450 \times \text{受歧视职业}$$

$$\text{职业地位(城镇)} = 53.49 + 0.287 \times \text{受教育年限} + 0.0211 \times \text{月收入(百元)} + 8.794 \times \text{最高管理者} + 5.601 \times \text{中层管理者} + 3.219 \times \text{基层管理者} + 1.690 \times \text{党政机关} + 1.593 \times \text{事业单位} + 1.621 \times \text{企业单位} - 26.378 \times \text{受歧视职业}$$

我们发现,教育和收入对城乡女性职业地位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农村中,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较大,而收入则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提高利于农村女性进入地位较高的职业;城镇中,教育、收入均对女性职业地位具有影响力;教育在农村女性进入较高地位职业的作用大于城镇女性。权力因素和部门因素对城镇女性职业地位的获得作用十分显著,而在农村则并不显著(表2)。提高教育是农村女性进入较高地位的唯一的途径,而城镇女性则除了提高教育之外,可以借助权力因素、部门因素提升其职业地位,与此同时,提高教育也增加了其进入权力部门、管理部门(教育与权力因素、部门因素的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0.91、0.89)的可能性。从事同样歧视性职业的情况下,农村女性被歧视的程度要高于城镇女性。

表2 城乡女性职业地位获得模型结果

	农村		城镇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受教育年限	0.382**	0.093	0.287***	0.121
月收入	0.021	0.003	0.021***	0.035
权力因素				
高层管理	2.940	1.247	8.794***	0.231
中层管理	1.256	1.478	5.601***	0.003
基层管理	1.389*	0.939	3.219*	0.374
部门因素				
党政机关	1.167**	0.009	1.690*	0.292
事业单位	1.483*	0.342	1.593***	0.831
企业单位	3.132	1.833	1.621***	0.288
歧视因素	-32.450***	0.024	-26.378***	0.937
常数项	58.360**	0.098	53.490***	0.201
解释比例	74.5%		83.2%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0$

①权力因素,包括3个虚拟变量:是否是单位的最高管理者、是否是单位的中层管理者、是否是单位的基层管理者;部门因素,包括3个虚拟变量:是否就业于党政机关、是否就业于事业单位、是否就业于企业单位;社会歧视因素,包括1个虚拟变量:是否是受歧视职业。

五、中国女性职业地位的变迁

(一) 职业地位的变化

通过构建职业地位获得模型,得出影响女性职业地位的因素,依据影响因素计算衡量女性职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简称 SEI)。中国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变化趋势(图 1)。呈现阶段性缓慢上升的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0 年的出生队列,女性的 SEI 值缓慢上升;第二阶段:1961—1975 年的出生队列,女性的 SEI 值保持稳定;第三阶段,1976 年及以后的出生队列,女性的 SEI 值大幅度上升。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女性在职业地位呈现缓慢提升的过程中阶段性特征明显,1975 年之前的出生队列中,女性队列间的职业地位差异不大,提升的幅度较小,真正明显的改变出现在 1976 年之后的出生队列,职业地位有了大幅度升高。但各个出生队列的 SEI 值最高值低于 55,即便职业地位有了显著升高,但仍处于中下水平,总体看来,中国女性的职业地位仍然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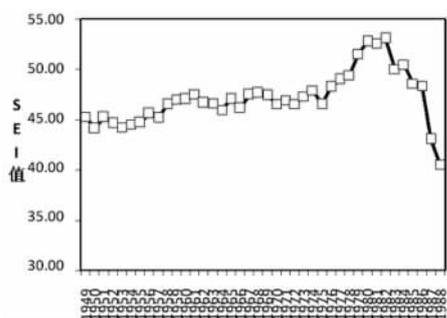


图 1 队列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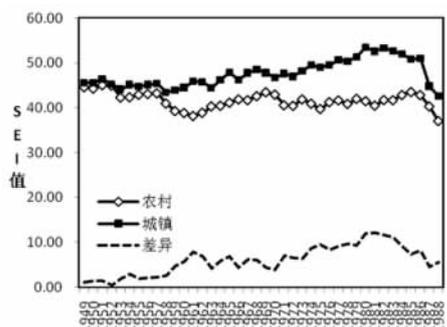


图 2 城乡队列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城乡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图 2),具体表现为:(1)城乡之间的 SEI 值从最初的相差不大逐渐出现分化,且分化过程中城镇女性的 SEI 值始终高于农村。城乡女性的职业地位最初并没有较大差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女性的职业地位逐渐高于农村女性。(2)

城乡女性的 SEI 值变动过程中均呈阶段性,但各具特点。城镇女性 SEI 值呈现保持稳定、缓慢上升的过程;农村女性则表现出缓慢下降、迅速回升、保持稳定的过程。总的看来,城镇女性的职业地位逐渐上升,而农村女性的职业地位稳定中略有下降,在第一阶段下降之后保持稳定,虽然中间几个队列略有回升,但略低于下降前的水平。(3)女性城乡间职业地位的差距逐渐增大,城镇女性的职业地位高于农村女性,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需要注意的是,1985 年后出生队列的 SEI 值均出现下降趋势,这并非是女性职业地位下降,而是受到调查数据的限制,截止到调查结束时 1985 年之后出生的女性年龄小于 20 岁,处于接受高等教育年龄段,已就业的女性大多未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就业层次较低,据此计算的 SEI 值偏低,这几个队列女性的职业地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

(二) 职业层次的变化

社会经济指数是测量职业地位的重要指标,社会分层的学者们利用 SEI 值对职业地位进行分层。通常采用五分法将 SEI 值划分为五个层次,其中 0-19 分为下层,20-39 分为中下层,40-59 分为中层,60-79 分为中上层,80-100 分为上层。其中,上层职业主要是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国家机关及企业领导层、法官、医生等职业;中上层的职业主要包括国家机关以及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如国家机关处长、公司经理等),以及媒体和娱乐类从业者职业;中层职业主要是由办事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业人员组成;在中下层职业主要由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体力劳动者组成;下层职业包括由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组成。我们依据五分法分别计算不同职业层次的女性所占比例,用以衡量中国女性的职业层次结构的变化。

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女性的职业层次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由最初的“T”字型向“I”字型过渡。中国深刻的社会变迁对女性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个人的职业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选取 1949 和 1980 两个出生队列进行对比^①,1949 年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的职业层次很低,以下层职业为主,呈现明显的 T 型结构,即下层职业占绝大部分比例,随着职业层次越高,女性的比例越小。1980 年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的职业层次发生巨大的变化,呈现 I 型结构,下层、中下层比例缩小,中层、中上层、上层比例显著增加。随着队列的发展,绝大多数女性处于中等层次,职业层次开始向上流动,但处于上层职业的比例依然较低。以往学者通过研究也发现这一特征,他们从性别隔离的角度给出解释,认为受到社会传统观念、规范甚至是制度的层面上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和定位,以及长期“社会化”过程中,性别差异的教育(家庭教育、正规教育)得以维持、强化并传承,愈演愈烈的职业性别隔离限制了女性职业地位的获得和流动,尤其是高层次的职业地位上存在着“玻璃天花板”^②，“女性难以流入最高决策层”。

^①由于以队列为研究视角,因此,无法逐一描述几十个队列职业层次的结构。我们关心的是,女性的职业层次究竟发生何种变化,因此,只需选取有效的两个队列进行对比即可。

^②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设置一种无形的、人为的困难,以阻碍某些有资格的人(特别是女性)在组织中上升到一定的职位。女性或是少数族群没办法晋升到企业或组织高层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或经验不够,或是不想要其职位,而是一些针对女性和少数族群在升迁方面,组织似乎设下一层障碍,这层障碍甚至有时看不到其存在。

城乡队列女性的职业层次具有不同的变化历程,具体表现为:(1)城镇队列女性的职业层次一直高于农村,各个出生队列中上层、中上层、中层职业的比例均高于农村,中下层、下层职业的比例低于农村;(2)城镇女性的职业层次提升的程度要大于农村女性,即城镇女性的职业向上流动的程度要大于农村女性;(3)城乡队列女性职业层次结构的变化各异,最初两者的职业层次结构均为T型结构,城镇女性的职业层次结构转变为I型,而农村女性则依然为T型。城乡队列女性的职业地位发展过程出现分化,且分化的程度不断增大。

六、主要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的发展受到“历史时间”的影响,其阶段性特征与中国就业制度的调整过程相契合。制度政策的力量强制性的影响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过程。建国以来,中国女性就业历经四个发展阶段:政府倡导、组织安排(1949-1957年),政府包揽、统包统配(1958-1980年),市场配置、自主发展(1980-2001年),宏观调控、积极促进(2002年至今),1949年以后出生的女性恰好经历了后三个阶段。统包统配时期,1949-1960年出生的女性恰好在这一时期就业,政府对女性就业采取行政干预,政府包揽使劳动力“市场”消失,就业范围遍布各个领域,“人人平等”“大锅饭”式的工资分配制度等使职业间差异缩小,女性的职业地位日渐升高。进入劳动力市场自由发展时期后,女性的就业机制逐渐从分配制过渡到市场制。这一时期,女性的职业地位虽然依然逐渐提升,但是速度渐渐放缓。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引发下岗失业,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职业地位开始下降。自此以后,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使女性处于弱势,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女性更多的流向低层次的职业,进而职业地位开始下降。不同政策背景下的女性就业过程必然带着“历史时代”的色彩,制度变迁的强制力量成为制约职业发展的“看不见的手”,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发展。

城乡女性的职业发展过程存在着分化,城镇女性职业地位明显提升,职业层次结构发生改变,社会地位提高,但农村女性职业地位始终偏低,职业层次结构没有变化,社会地位依然偏低。城乡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差异源于地位获得途径上“认识”差异和享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农村中,女性教育和职业地位的获得呈现单一的直线关系,提高受教育程度是进入高层次职业、提高职业地位的

唯一途径。而城镇女性中,权力因素、部门因素不仅是影响职业地位获得的独立变量,成为教育与职业地位之间的中介变量,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城镇女性进入权力部门、管理部门的职业增加了可能,而职业所具有的权力特征和管理特征则决定该职业地位。“认识”的差异和享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已成为长期城乡分割体制下形成的普遍“社会认可”,“社会时间”的约束力量引发城乡女性职业发展过程的分化。

职业地位的变化是中国女性职业历程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镶嵌在社会变迁之中,具有浓厚的“社会性色彩”。职业与出生、教育、婚姻、生育、死亡等一系列重要生命事件共存于生命历程之中,因此,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带有“社会性色彩”的生命事件发展模式的转变与出生、死亡模式转变一样属于人口转变的范畴,属于人口转变的社会内涵,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与此同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人口转变模式必然影响人口社会性转变的进程,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二者从侧面印证了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动态的过程,无疑从另一个视角诠释了人口转变理论,将其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CLARK W A V, DEURLOO M C, DIELEMAN F M. Tenure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Micro-level Family and Macro-level Economic Shifts[J]. *Urban Studies*, 1994(1):131-154.
- [2] 李强,邓建伟,晓箏.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 *社会学研究*, 1999(6):1-18.
- [3] 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3):86-98.
- [4] ELDER GLEN H JR. Making the Best of Life: Perspectives on Lives, Times, and Aging, Generations[J]. 1991(1):12-17.
- [5] 李强,刘海洋. 变迁中的职业声望——2009年北京职业声望调查浅析[J]. *学术研究*, 2009(12):34-42.
- [6] 周怡. 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J]. *社会学研究*, 2009(6):206-225.
- [7] 李春玲.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 *社会学研究*, 2005(2):74-102.
- [8] 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 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5):100-109.
- [9] 许欣欣. 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J]. *社会学研究*, 2000(3):67-85.

[责任编辑 郭玲]

Research on the New Chinese Female Occupational Status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WANG Fu-Bai hu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2008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nges of female occupational status in China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model". According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ime" in life course theory, we find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in female occupational status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historical time" an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role of "social time". There is a strong "social color" in femal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is interpreted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and to be deepened.

Key words: life course; occupational status; demographic transition